

# 大学梦实现之后的思考

本报特约撰稿人：郑国和

为纪念中国恢复高考四十周年，我几个月前写了一篇题为“我的两次大学梦”的稿子，回忆四十年前那场变革怎样改变了我这个“黑五类”家庭出身的青年的命运。稿子寄出后总觉得还有些重要的话没有说到。几个月来，这个问题不断地在我脑子里翻腾，不肯离去。渐渐地，我意识到那些该说而没有说到的话是自己在实现了大学梦之后常常思考的几个问题，包括我们77-78级大学生这个中国教育史上特殊群体的历史地位和应该担负的历史责任。今天我就来谈谈这个话题。

美国文学评论家、社会活动家 Irving Howe (1920-1993) 把“现代主义”定义为“以怀疑主义、不确定性、不可知论和思想意识的相对化取代(中世纪的)宗教式的确定性和道德的绝对化”的思潮(见Classics of Modern Fiction, 1968, 5页)。马克思在他的《自白》中也说他最喜欢的座右铭就是“怀疑一切”(见达·梁赞诺夫,《卡尔·马克思的自白》)。现代大学培养学生除了教授学生一技之长的专业知识外,更重要的是要培养他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以及对事物的怀疑态度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后者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大学毕业生是国家的栋梁,担负着国家未来的使命。我们77-78级同学更应该担负起以这样的视角观察中国社会、发现问题的历史使命。我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许多以前没有注意到的问题。今天仅就其中的四个问题与大家探讨。

第一个问题是中国的经济改革理论和共产党建国理念之间的矛盾问题。1986年10月,邓小平发表了“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的谈

话。邓小平的这个“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与他1960年代提出、在文革中受到批判的“白猫黑猫论(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是一脉相承的。可以说有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才有了后来的经济特区和中国经济的腾飞。对计划经济下中国的穷日子记忆犹新的我们来说,中国经济的腾飞当然是令人骄傲和鼓舞的。然而,我们也不能不注意“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与共产党的建国理念之间的矛盾。《共产党宣言》里写道:“共产党人可以把自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资本论》里写道“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正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原理,中国共产党才实行了从土改到三大改造的社会主义运动,使中国从1950年代后期进入了社会主义的初级发展阶段。问题是土改和三大改造以前的中国本来就是一个人一部分人穷、一部分人富的社会。如果现在又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中国社会重新变成一部分人穷、一部分人富的社会,那么当初何必牺牲那么多先烈、杀掉那么多地主资本家去消灭旧中国建立新中国呢?“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不是与共产党的建国理念背道而驰吗?这不仅是我的疑虑,也是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的疑虑。今天他们被誉为拉开了中国改革的序幕、创造了“小岗村精神”英雄群体,而1978年末他们在大包干协议上按下了手印的时候却是立下了生死状的。为什么这些农民为摆脱穷日子搞土地承包要冒坐牢的危险?因为他们知道大包干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中国是冒了天下之大不韪的。请注意我这里并不是反对经济改革,我只是因为经济改革理论和共产党建国理论之间的矛盾对中共是否变质

抱有疑虑。至于先富起来的群体中包括大量利用政治资源暴富的红二代和大家公认的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社会产生的巨大贫富差距以及信仰缺失,那是让我对上述矛盾抱有疑虑的另一个原因。2001年江泽民允许资本家入党的七一讲话和前不久北京市驱赶“低端人口”的做法则更加深了我的疑虑。作家余华最近在一篇文章中说“中国书写了一部荒诞的阶级斗争史。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经历了土改和三大改造)既没有地主也没有资本家……执政者要求人民: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今天的时代有阶级了,执政者要求人民:千万要忘记阶级斗争。”可见余华和我一样对中国的经济改革理论和共产党建国理论之间的矛盾抱有疑虑。

第二个问题是媒体必须姓党的问题。2016年2月习近平对中国媒体提出了必须姓党的要求。要求提出后中国媒体异口同声表示坚决拥护。其实中国的媒体从来都是姓党的,没有发出过任何不同的声音,否则就要遭到整肃。比如1976年清明节天安门广场事件时,《人民日报》先于4月8日发表文章《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10天后又发表社论《天安门广场事件说明了什么》再次将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政治事件。然而1978年11月14日该报却刊登了北京市委的决定:“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为什么完全相反的结论会出自同一家媒体呢?原因就是它总是姓党,谁在台上按谁的旨意办,没有独立的声音。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在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提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这就是所谓的“两个不能否定”。如上所述,中国的经济改革理论和共产党建国理念之间是有矛盾的。然而由于媒体姓党,不能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结果是矛盾不能解决,理论不能自圆其说,甚至引起严重混乱。比如虽然中共从邓小平时代就抛弃了毛泽东时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2001年以来甚至允许资本家入党,2014年9月《红旗文稿》却刊发了中国社科院院长王伟光鼓吹“国内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的文章《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虽然中国私有企



大学梦碎时的作者

业从无到有产生了阿里巴巴、腾讯、华为等在世界资本市场颇具竞争力的巨头,今年1月中共理论刊物《求是》杂志旗下的《旗帜》栏目官方微博上却刊登了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周新城的文章《共产党人可以把自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按说在经济改革三十多年后的今日,如此充满文革式语言和正统中共建国理念的文章会遭到批判或至少引发热烈的讨论,但由于媒体必须姓党,没有人敢对这两篇奇文做出真心的反应,结果它们为“两个不能否定”在理论上做了背书,一方面中共可以继续说自己“不忘初心”,另一方面阿里巴巴等公司可以继续发财。英国作家奥维尔于1949年出版了《1984》,这部小说刻画了一个虚拟但令人恐怖的到处是思想警察、时时监视公民的极权社会。其真理部负责宣传、文教和篡改历史,使历史和一切文献总是符合当前“老大哥”即党领导人的话语。要求媒体必须姓党会不会把中国的媒体变成《1984》里的真理部呢?哈佛大学教授鲁宾(Jay Rubin)在其研究日本帝国新闻检查制度史的著作中指出,“一个国家最危险的时候莫过于当它只有一个声音的时候。”鲁宾教授的话已经为中国文革的惨痛教训所证实,将来会不会为“媒体必须姓党”的后果所证实呢?

(下接第B3版→)



(网络图)